

新作聚焦

王昕朋长篇小说《漂二代》

他们需要怎样的身份认同

□汪 政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是一部不太好归类的作品，可以说它是底层文学、问题小说、反腐小说，也可以是一部成长小说、新城市文学和文化小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容纳了太多的社会现实内容与深广的历史、文化思考。这部作品再一次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同时也再次表明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家，在现实矛盾突出时期应该具有的文学与思想担当。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它以一次偶然的治安案件作为叙述的起点。农民工子弟肖祥、张杰与房地产开发商汪光军的儿子汪天大在小酒馆发生冲突，本来已经和解，但汪光军觉得丢了面子，找人为汪天大重新作了脑震荡的医学鉴定，把肖祥给抓了。这一“假伤门”事件在农民工聚集地十八里香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种种社会矛盾因之更加突出，由此牵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各种人物也纷纷登场。靠不择手段起家的汪光军当然不肯轻易认输，因为这样不仅输掉了自己的面子，更输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在商界的利益；副校长冯援朝也不能输，他的利益是与汪光军连在一起的，他们俱荣俱损；而十八里香的河南农民工们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则经历了几番变化，他们既存在整体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境遇，但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不断超越自我，为了公平和正义，为了他们曾经的苦难和屈辱，也为了明天更好的生存，他们不再妥协，同时，他们也不断地从情感走向理智，从懵懂走向自觉，从盲动走向法治。

小说中的十八里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群落。我说《漂二代》是一部新城市文学和文化小说就是从作家对这一文化群落的生活描写来判断的。十八里香原是北京郊区农村，随着城市的扩建，它现在已经是北京市的一部分。由于原来处在城市的边缘，所以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而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大都源于同乡的关系，比如十八里香基本上就是河南人，所以，这样的地方是亦城亦乡的，是城市中的乡村，是文化的飞地。王昕朋对十八里香的描写实际上涉及到了城市文化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古典的城市是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一些乡村因为政治、文化、军事和宗教的原因而变成城市。而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建设则更为多样化，它们可以创造，可以扩张。相对于古典城市，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一时间难以消化的新问题。

比如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需要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是原先的城市一时间无法生产的，所以就要从农村进行各种方式、各种规模的“移民”。这自然会改变城市原先的人口结构与城市单一的文化性格。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面是“新北京人”，一方面仍旧是自己的老乡，他们说着方言，按自己家乡的习俗生活，延续着自己故乡的风俗与价值观。韩土改千方百计洗刷自己身上的故土痕迹，刻意与十八里香保持距离，但他赖以生存的还是农民式的智慧与乡土民间文化。李跃进的起落也是建立在乡土人情观念上的。虽然到宋肖新、宋肖辉、张杰、肖祥等已经是“漂二代”了，但在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持着浓重的“进城”前的文化色彩，这些正是现代城市的特征。急速的城市发展、大规模外来人口的进入与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城市呈现出“杂色”，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汇和融合，使城市拥有了新鲜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在现代城市，固守传统的城市风格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它只会阻碍城市的发展。其实，与乡村相比，城市一直表现出开放与变动不居，它的生长速度与面貌变化要比乡村快得多，只不过这种功能与特性在现代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漂二代》对现代北京的描写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与城市理念，它着重书写的是北京的“变”，是新北京人给这座老城市带来的多样化的元素，这是现代城市开放、包容的方向——一座城市，只有敞开大门，保持流动，才会发展的动力。

文化冲突与身份尴尬是《漂二代》的主要主题。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自在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又非常希望进入北京文化。他们对这个城市抱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她是他们的希望与明天，又是给他们带来伤痛与歧视的地方。特别是身份认同是他们进入城市最大的障碍，也是他们融入城市与城市零距离生活必须要穿越的隔离带。不可否认，城市在这方面还没有作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包括制度设计，甚至可以说，城市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自己的自私与双重标准。当城市需要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人力与消费人口时，城市鼓励外来人口，但是当外来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时，却遭遇到了城市的拒绝，这可能是当代中国社会较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漂二代》中的人物大都是在北京出生，或

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北京，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在北京打工，但是他们的身份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品取名“漂二代”，一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北漂”、“南漂”，指的是离开故土到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则是指这些人的身份状态，包括他们的上一辈，虽是农村户口，但人却不在农村，离土不离户，同时他们身在城市，却不是城市人，在城不属城。索尔·贝娄曾将他笔下身份缺失的主人公称为“挂起来的人”，王昕朋将中国进城的农民称为“漂着的人”，他们既不在农村，又不属于城市，始终在两极漂移。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宋肖新这样表达自己的身份感受：“老家对于宋肖新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在北京这么多年，她是外地人；到了老家，她感觉自己也成了外地人。”身份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属性称谓，在中国，它同时是一个人的文化标签。身份认同的同时就是文化认同，包含着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因为这些因素的差别与不平等，最终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平等，因而，身份歧视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肖祥因“假伤门”事件被抓获后在十八里香引起了骚动，作品对当时的群情激愤有一段描写，可以看作是这种歧视的缩写：“本来是出主意想办法的‘诸葛亮’，却演变成了控诉不公正待遇诉苦会。张三说，咱来北京快20年了，黑发变成了白发，却怎么也直不起腰。北京人养的狗走大街上都神气得很，感觉自己活得还不如那条狗。李四接腔说，可不是咋的，有钱人家的狗都能在北京上户口，有的为省钱还跑到乡下给狗上农村户口，这不是腌臜咱农村人嘛！王二说，俺上公交车售票员跟防贼一样，生怕俺逃票。到超市买东西，售货员一听俺这口音，俩眼珠黏在俺脸上，怕俺藏着掖着偷东西。真他妈的窝囊！年龄大点的赵五说，你们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没有北京户口的叫盲流，一有重要的节日就把咱当流一样往外挤，到了火车站还得把大箱子行李翻个底朝天。活急了吧不让走，工地四周都是戴红袖章的，像看劳改犯似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受与偶然的遭遇，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教育与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限制。王昕朋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制约性因素做了深入的思考，说穿了，就是户籍制度。本来，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应该是一种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利，以个人为本位的人

口管理方式，但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却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当然，如何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依然在讨论，《漂二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并没有提供户籍制度改革路线图的义务，但确实集中而深刻地描写了落后的制度对人的伤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漫长的制度争论与外来人口付出的巨大成本。到了肖祥这一代，没有户口，教育就成了问题，“有的回老家勉强读完高中，又回北京来找父母，就业解决不了就做‘啃老族’；有的一离开父母像脱了缰的野马，混迹社会，犯了罪进了监狱，实在不愿回去的，就在北京读民办的中专中技，更多的加入了父辈的打工行列……”在作品中，拥有北京户口，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是来北京务工者两代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可以付出“一切”。这“一切”包括生命、理想、奋斗，也包括牺牲、交易、堕落，当一个城市无视这一群体的身份诉求时，它必然要为之付出沉重的社会管理成本。《漂二代》看上去的冲突是围绕“假伤门”事件的，但内存的矛盾却都是缘于十八里香的身份焦虑，是一种被伤害、被歧视、被抛弃的社会心理的渲染。

虽然如此，《漂二代》并没有停留在平面的批判与谴责上，应该说，汪光军这样的不法商人和冯援朝这样的贪官刻画得是很成功的，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宋肖新、肖祥等“漂二代”。王昕朋也描写了他们身上的复杂性，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平时的愤怒、悲伤和失望，但最终，他们站住了。作家显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或者不如说，王昕朋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新人。肖祥虽然因“假伤门”事件被抓获了，但他坚信法律的公正，乐观地对待命运。特别是宋肖新，作者是带着理想、同情、赞美与祝福来描写她的，她虽然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但却因此激励出了坚强、自尊、同情与智慧。强权的欺压、名利的诱惑、亲人的误会都没有击倒她，虽然，面对几乎没有希望的抗争，她也有过犹豫，她知道，“现实环境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存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人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另外一个人轻而易举拿走时，往往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鲜血淋漓；一种是投降，求得生路，以图东山再起。现实生活中选择走第二条路的是多数人。”她也过这样的自我暗示，“也许人就应当活得现实一些。既然你改变了现实，就得去适应现实。其实，这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往往只是一念之差”，但她最终走的依然是不妥协的道路。不仅是宋肖新，还有张杰、张刚、冯功铭等，作品都写出了他们的变化。“漂二代”是成长的一代，是城市新主人，是城市的希望所在。我不否认这样的描写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面对现实矛盾，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还应该让我们看到理想，看到那些努力改变现实的人们，并且受到感染和鼓舞。

这是塑造新人的作用，也是现实主义的力量体现。

创作谈

有人问我，你在国家机关工作，怎么会熟悉《漂二代》中这些人物和故事？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感情。我们常说，文学来自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在我看来，它更是作家感情的反映和体现。

4年前一个周末的傍晚，朋友带北京某大学一位女生来找我。那位女生泣诉说，她的男朋友、另一所名牌大学学生在城郊结合部一家饭店吃饭时，因为一件小事与当地一男子发生争执。当地男子听她男朋友是外地口音，一句一个“外来的野种”，边骂边动手。她男朋友个子弱小，那个本地男子高大魁伟占着上风，而且刚刚动手就被人拉开，相互之间没有造成伤害。但两周后，她男朋友却因伤害被刑拘……，这个情况与《漂二代》中“假伤门”的情节几乎相近。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让我感到痛苦与不安。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时，我报名到北京某区深入生活，到农民工聚集地区深入生活，用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漂二代》这部长篇，是我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和思考的文本呈现。对“漂二代”的聚焦，并不是简单地为这一群体贴标签，而是要提示身处于此一社会境况之下，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应忽略的；而在写作过程中，我所着意侧重的是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想写出他们身上的温情与爱意、恨仇与苦痛、困惑与迷惘。

在我看来，现实感在小说写作中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所谓现实感代表的并不单单是对传统写实主义的倚重，以编年史、地方志和人物志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做出录像般的映照和摹写。我所理解的“现实感”，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对生活实感和命运遭际的书写，又不乏对内心世界和精神体验的叙述。须知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是关注外部世界现实状况的书写倾向，实际上，感情的介入往往同时掺杂其间，也惟其如是，才能避免对小说写作的简单化理解，才能还原事物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对类型生活的特定关注是我持续不断甚或有时是逐渐升温和写作尝试，尤其对底层人群的生活样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笔力，这也许与我关注各种生存状态中的平民意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流露的平民情感息息相关。如此这般的感悟和思考，构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在《漂二代》的写作过程中，我竭力保持自己的平民立场，倾注自己的感情，通过背负着沉重的身份危机与现实困境的“异乡人”与形态各异的“北京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宋肖新与律师男友冯功铭的交往、肖祥委曲求全娶了并不适合自己的北京女人、张杰与富二代汪天大的冲突、李豫生与汪光军和冯援朝的苟且、汪光军和高律师对肖祥的设谋陷构、区委书记的慰问与李京生的执拗等等。在坚守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时，我努力保持理性审视的力量，以求使之从一种普通的情感，上升到心理层面的映射，甚至精神层面的反思。

再说“漂二代”。面对一代代人矢志不移的城市情结，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作出反思：以“漂二代”为代表的群体，是否对“北京户口”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趋新弃旧思想过于执念？我意不在否认他们追求人生的努力，需要提出警醒的是，在盲目而迫切的追逐过程中，很多人失去了本不该过分丧失的简单的快乐和健康的人生。说到底，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还是缺乏一种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仿佛一切都以高、大、新、富、快为衡量标准。在这样的风气和氛围中，泯灭了严谨、理性和从容的姿态，失落了天地，更消除了情怀。“可是，她（指宋肖新）也不想打开老屋的门锁，就是想，她根本没有钥匙，或者老屋根本就不需要钥匙。”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家乡早已面目全非，再难回归，而都市欲望与生存危机却如梦魇般如影随形。身份的无依感与断根的漂泊感充溢着“漂二代”的生活，即便是像韩土改那样的暴发户，用足够的金钱将女儿韩可可买进高学费的贵族学校，依然免不了将她视为“土妞、下里巴人”。作为一种在阶层/政治议约下的经济/生活共同体的“漂二代”，留给他们，已经不仅是制度和社会问题，更是引发了深层次的内心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危机。因而我认为，所谓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其本身也是立体而丰富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性。所以在《漂二代》的写作中，我试图将人物和事件本身所对应的期许与反思、想望与审视统统呈现出来。

围绕着“漂二代”的代表人物肖祥的陷害与营救，是我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部分，而在北漂们与僵化体制与传统壁垒的斗争中，人性的善与恶、真与伪、仇与快、爱与痛彰显无余，这是我在小说中试图追索的叙事效果。然而，我更深的意图还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很多人在对肖祥施以援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营救”自己——通过不断地回溯确认个人的角色定位，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出发，以满腔之热血，在逼仄的现实中挣出生存的空间和人生之尊严，以此消除内心之愤懑，纾解己身心之焦虑。与其说这是迫于无奈的反抗压迫之举，毋宁说是借对他者的态度和姿态，完成对自我的一种救赎。因而我所关注的底层生活，以及我所持有的平民立场，与其说是在聚焦、关注甚至试图提出问题并最终释以解决，不如理解为对我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是我在生存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感情的情结摆脱不掉时，援笔而就的价值投向和精神牵引。这种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辩证乃至彼此驳难，也成为我小说叙事的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的重要面向。

“森信·宝力杯”世界华文诗歌大奖赛征稿启事

为振兴诗歌创作，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报社与诗歌月刊杂志社等联合发起“森信·宝力杯”世界华文诗歌大奖赛活动，面向世界上所有用母语写作的诗人征集稿件。

征文内容要求以诗意的笔触，讴歌时代变化，抒发对真善美的追求，咏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情怀，以及对爱情、亲情的咏唱等；对以诗的形式，融入投资方人文情怀和精神品质的作品，将予特别关注。征文体裁为现代诗，150行以内，首数不限，限投一次，多投无效。作品页面不得署注作者姓名和其它标注，否则作废稿处理；请另纸注明真实姓名、地址、邮编、电话和邮箱；投稿专用邮箱：55494750@qq.com。

本次大奖赛设特等奖1名，奖金10000元；一等奖2名，奖金各5000元；二等奖3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若干，奖金各500元。征文从2012年2月10日起，至2012年7月10日止。

新作快评 肖克凡《喜荣归》，《十月》2011年第6期

一次冒险却成功的尝试

□周其伦

天津作家肖克凡的中篇小说《喜荣归》是一部有别于以往谍战文学的“个性”作品，小说中塑造的崭新艺术人物形象和精心的构思令人眼前一亮。

《喜荣归》所展现的场景，作为谍战题材似乎不算新鲜，说起来还多少有一些老套。但是，作者却能够依靠创作实力另辟蹊径，为我们架构了一部看似老套、实则充满新意的小说，显现出作者足够的生活阅历和开阔的视野支撑。可以说，肖克凡以相当厚实的文学功底，不仅没有踏入同类题材的白槽，而且还奉献出许多新意，让一个貌似熟悉的故事读起来别有洞天。

首先，《喜荣归》在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添上了别具特色的“肖式”新意。

主要人物俞明喜，从抗战时期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天津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为祖国和民族做了大量的工作：

隐藏极深的日本老牌特务吴荣成，却一直是他的私交甚笃的密友。这为两人之间的较量埋下了伏笔。作品开始于淑德女中爱国忧民的瞿校长被暗杀这一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并从此牢牢牵引着读者的视线，可读性极强。

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展开，作品细腻地表现出天津地下党特工、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之间的殊死较量。而为地下党工作的俞明喜，却因为地下斗争的需要，一直保持着普通身份，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天津市地下党老燕等几个人知道。而在故事结尾，当俞明喜和吴荣成这对“密友”，竟狭路相逢于冀东抗日根据地时，面对严酷无比的敌特甄别，俞明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也为了揪出隐藏在根据地的日本特务，不惜与吴荣成同归于尽。俞明喜临终前的瞬间，眼睛里满含对光明的期待和对妻儿的柔情。这个画面让我长久地震颤不已。相信读者读到这里，也一定感慨万端。

曾几何时，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有着千千万万个像俞明喜这样的人默默地为它奉献着，有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却限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至今都没有获得昭告世人的名分。这对先烈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肖克凡塑造的俞明喜这个艺术人物形象，让我们不安的心有了些许安妥，在文学创作上也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喜荣归》还有一个有别于其他谍战作品

短评

羊的样子令我心痛

□康启昌

十几年前，信手抓过一份《文艺报》，一下就翻到了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样子》。三下五除二，读完，转身就把报纸塞给老伴：快看，绝对精品！后来，《羊的样子》被原野收到了《梦回家园》。而这篇散文集的封面和扉页上，都有一只长角细腿满脸和气的公羊，孔雀似的挺着无愧于心的胸脯。这就是“羊的样子”。见到它，我莫名其妙地痛。

总揽原野散文，我突出的感觉是艺术品质的优秀。当下有的散文文化信息不少，知性理性也很强，而文学性艺术性却显得单薄。原野则不然，他写散文，如同画家画画、音乐家作曲、雕塑家塑像一样，每一个音符、每一笔色彩、每一块泥巴都孕育在文学艺术的胚胎里。关于他散文的艺术特征，我想说三点：

一是音乐性，即可听性。这当然不是说它在文中设置了多少骈体的乐句，也不是说它运用了怎样惊险的辙韵，而是说，它具有与音乐相通或相近的艺术特质。它是散文，却在破坏了骈偶的同时达到了音乐的境界。它巧妙地运用了汉语四声的节奏，在文字的平仄声里构筑起伏跌宕的波澜，发挥阴平、阳声、元音的悠长和响亮，避免仄声、辅音堆积的佶屈聱牙。

二是绘画性，即可视性。不用油彩，不蘸颜料，笔下自生斑斓。他的绘画工具是纯熟的现代汉语。他在不急不躁、安安静静的描述中，顺手修辞。他善用比喻、拟人手法。他的比喻，在秩序感很强的语言氛围中，对喻体不惜浓墨，给读者创造一个个鲜活的意象。他把没有感情甚至没有知觉的东西，当做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来描写。在他的笔下，众生平等。羊的样子，其实就是人的样子。读《羊的样子》，你不觉得它是你身边的一个吗？整体式拟人格，张力含蓄。我试举几例：

“在送行的队伍中，不止有孩子，还有黄狗、小羊羔和永远垂着头的老马。它们也许不知这是在干什么，但也这么往前走着。”读到这里，我甚至想，那老马也许戴着一顶蒙古族人喜欢的礼帽吧？

“阿拉它在述说的时候，不时看

满特嘎一眼，她一定感到嫁给这棵树是十分幸福的。而原来挤在满特嘎脸上的话语也消失了，他享受着没有思想的快乐。像一头老牛，卧在晚风的草地上，望着远处的牛群一动不动。”把满特嘎比作一头老牛，描述老牛悠然的样子，活脱脱地画出满特嘎进入禅境的神态。

“交织而成变成所谓地籁——浑然的声波，像大提琴在低音声部的运弓，一直往右拉，不回弓。曼托瓦尼乐队就是这么处理尾音的——录音时，把弓起声贴在回弓上。就如同乐队的人合力运一把弓，边运边走，从斯图加特走到瑞士琉森，像一队贩私盐的人们。”先把声波比作大提琴运弓，进一步比作曼托瓦尼乐队的演奏，又进一步把演奏比作盐贩子在行走，层层比喻，深度描绘，真是妙极了！但是我要打住，因为这种借用比喻和拟人格的修辞使画面生动活泼的绝技，不胜枚举。

三是地域性，即作家的个性。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打上了地域的印记。鲍尔吉·原野，祖籍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鲍尔吉，乃蒙古族诸部落中黄金家族的姓氏。他在娘肚子里就继承了蒙古族高贵的血统。他的散文的艺术风格正如草原上的阳光、空气、月亮、露珠，清新、亮丽、沉静、从容。他不过分经营笔力，不做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语调也不急剧尖拔，不咄咄逼人。

童年，他在赤峰市昭乌达盟公署家属院度过。红砖平房、短垣小院、菜地黄狗，有汉族人家定居草原的宁静，没有游牧人家的蒙古包、牛栏、羊群。父亲是翻译家，他自幼便接受蒙汉双语教育，这种生存环境，自然产生了民族融合的人文背景。在他恪守民族特征，接受文学全球化挑战时，必然会有蒙汉文化交汇的优势。他用童年时代民族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在表现现代世界时，他有更加复杂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描绘。《我妈妈的娘家亲戚》《文革旧邻》《乡下女人》《小羊羔》等都是地域性很强、弥漫着浓浓的草原芳香的佳作，读者可细心品咂。原野散文的根扎在草原，却可以走向世界。